



【言为心声】

破产在中国是一个企业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概念，如果企业宣布破产，那么就意味着企业寿终正寝，企业家不可能东山再起。

兰世立案是中国商业环境下的蛋

乔新生

2013年8月7日,“湖北首富”、原东星航空公司董事长兰世立提前出狱。面对他的不仅仅有武汉持续的高温,还有官司。这个曾经叱咤风云商界巨子,该如何呢?

开办旅行社让兰世立积累了丰厚的人脉。然而,国有航空公司的歧视性做法,让他决定以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一场豪赌。他一口气租赁了数架飞机,创办了自己的航空公司。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让他陷入绝境。他致信武汉市和湖北省政府请求给予支持,希望当地政府能像美国财政部那样,向投资银行注入资金。然而,对于缺乏融资经验的武汉市和湖北省来说,拿出大笔资金拯救一个濒临破产的民营企业没有先例。正因为如此,湖北省政府几乎是出于本能,要求国家航空公司注入资金,解决这家用航

空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国有航空公司的出发点不在于拯救民用航空公司,而在于彻底收购这家民用航空公司的资产。为此国有航空公司向湖北省作出承诺,准备将湖北省的武汉市建设成为中部地区的航空枢纽。

兰世立不愿意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被别人抱走,也不愿意看到国有航空公司继续垄断中国航空市场。因此,在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促成的这进行一场豪赌。他一口气租赁了数架飞机,创办了自己的航空公司。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让他陷入绝境。他致信武汉市和湖北省政府请求给予支持,希望当地政府能像美国财政部那样,向投资银行注入资金。然而,对于缺乏融资经验的武汉市和湖北省来说,拿出大笔资金拯救一个濒临破产的民营企业没有先例。正因为如此,湖北省政府几乎是出于本能,要求国家航空公司注入资金,解决这家用航

链条彻底断裂,每天不得不支付航空公司和机场大笔的管理费用。2009年8月,武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这家民用航空公司破产,2010年4月兰世立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逃避缴欠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从法律上来看,东星航空公司资金紧张的时候,完全可以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在西方国家,债务企业主动宣布破产整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前不久美国底特律宣布破产,就是摆脱暂时债务危机的一个法律举措。破产整顿是各国破产法的一个普通程序,其目的就是要给债务企业喘息之机。宣布破产进入破产整顿程序之后,债权人必须与债务人重新签订协议,商定偿还债务的时间和方式。如果债权人急于求成,那么,最终有可能会鸡飞蛋打,债权得不到实现。可以设想,如果美国航空公司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东

星航空公司破产之前,东星航空公司主动向法院申请破产整顿,那么,有可能会牢牢地把据债务重整的主动权。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地方政府,对于进入破产重整的企业都无权插手。东星航空公司可以在破产重整期间,与债权人重新安排债权债务的协议,也可以通过引入风险投资者,解决东星航空公司所面临的债务问题。

当然,从西方国家的破产经验来看,一些债务企业为了防止恶意收购,甚至会主动地制造一些不良债务,譬如,可以通过关联公司的担保,增加公司的债务风险,也可以通过合法的关联交易,把企业有用资产转移到风险相对较低的企业,这样做都可以让那些恶意收购者望而却步。不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雕虫小技几乎是所有胸怀远大抱负的企业家所不愿意采用的。甚至连破产这个概念,在中国都是一个企业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概念,如果企业宣布破产,那

么,就意味着企业的寿终正寝,企业家不可能东山再起。正因为如此,东星航空公司陷入困境之后,除了向政府申请资金之外,几乎一筹莫展。部分金融机构在破产重整过程中采取的落井下石的举措,使得东星航空公司雪上加霜。地方政府从介入那一刻起,就没有打算让东星航空公司恢复元气,而是要将它彻底置于死地。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东星航空公司彻底地失去生存的能力。

现在人们关心的是,提前出狱的兰世立否再战江湖?如果当初采取主动申请破产的方式进行债务重整,那么,可能还会有转圜的余地。假如债权人申请破产,法院依照我国破产法对于破产企业的资产进行彻底的清算,那么,兰世立可以掌握的资产就十分有限。笔者希望这位湖北武汉的明星痛定思痛,重新思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打起精神重新出发。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元来如此】

在优惠政策推动下,我们得不到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相反,倒会滋生出大量庸才乃至奴才。

人才优惠政策误导多多

肖国元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似乎更重视人才,更依赖人才所发挥的带动、示范与促进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全国各级政府制定的人才优惠政策不可数计。

最新两个例子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广东。其一,日前,佛山市顺德区人社局给该局首批 466 名高层次人才发放“德才卡”。持有该卡者在入户、配偶就业、医疗保障、子女入学、出境等方面可以享受优先优惠的公共服务。其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宣布 8 月 16 日起实施《前海合作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前海境外高端、紧缺人才可享受 15%个税补贴政策终于落地。

地方政府之所以频频出台人才优惠政策,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高层次人才会发挥自己的优势与潜力促进与推动本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给他们一些优惠待遇是一桩划算的买卖;二是各地都相继出台很多很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对人才的争夺日渐白热化,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乍一看,这样的解释朴素平实,非常在理。人才总是稀缺的,而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比一般人要大。在这样的理念下,要想拥有能为我所用的人才,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人才价码,推出优惠政策,到别处去网罗人才。这是全社会的共识,也是实际中通行的做法。然而,跳出简单的功利主义与近视的实用主义哲学,从人才规律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实际上,优惠政策下的人才效应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

其一,人才的成长依赖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发展、演变是一个长久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竞争机制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竞争意味着尽自己所能去试探、试错与学习,以取得新成绩,达到新高度。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真正优秀的人才总是不断激励自己,继续往开去。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才总会冒尖以得到社会的认可与重用。他们不需要别人贴标签,相反,人为贴标签的做法,不仅有着主观狭隘的硬伤,用学历、职称、工作经历等几个指标定性人才与否则对真正的人才评判可谓挂一漏万,而且这样的人为之作会阻塞人才成长的管道。因为既定的优待会懈

怠人的进取心,且有悖于人之成长的竞争性过程,而且,不合理的评判标准会误导社会与人才成长,其经济表现就是人才的边际效益会大幅下降。

其二,企业与政府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单元,它们的工作目的、行动方式与行为准则有着原则性区别。企业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获得回报,遵循效率原则。而政府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行事规则。为了招揽人才,企业会挖空心思,想尽办法。但是,它一定是在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去实施相关工作的,会监督人才的使用,评估使用的效能,以保障人才的经济性得以最大发挥。而政府插手为企业搞人才竞争,一方面有越俎代庖之嫌,另一方面往往动用公共资源,缺乏财政制约与经济激励。这样不仅难以保证人才效应的发挥,而且

损害公共利益。虽然人才的引进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其效益无法评估。我们绝不可能在公共收益与公共消耗之间做出像企业那样的精确的经济核算。

其三,人才优惠政策的频频出台表明了中国社会在人才流动、服务与管理上缺乏有效的常规机制,只有依靠特殊政策去解决问题。但是,正是这种超越常规的政策破坏了人才市场的公平竞争,它在鼓励一些人的同时打击了更多的人,在提升少数人的效率的同时降低了更多人的效率,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可以说,在优惠政策推动下,我们得不到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相反,倒会滋生出大量庸才乃至奴才。而这正是转轨中的中国社会最应避免的事情。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经济解释】

战争和自然灾害拉动了重建期的GDP增长,但是降低了未来的经济增长。

战争和灾害只会消灭经济增长

谢作诗

经济学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破窗理论”,讲的是好好的窗户,把它砸烂,重建,这会带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经济增长。这理论本该臭名昭著,不想却在当今社会,甚至是经济学界广为流传。

按照“破窗理论”,战争和自然灾害都是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的。但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破窗理论”的谬误首先在于没有区分GDP与财富的区别。GDP增长未必一定意味着财富增长。好好的窗户,把它砸了重建,好好的家园,战争和自然灾害破坏后重建,GDP是增加了,但是窗户还是那个窗户,家园还是那个家园,财富并没有增长。财富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是减少了。这是因为,假如窗户

没有被砸,家园没有被破坏,用来重建窗户和家园的资源是可以用来干别的事情的。但是这些资源现在不能用来干别的事情了,这是消灭财富。

“破窗理论”的谬误还在于没有区分今天的GDP增长和明天的GDP增长。

或许是没有重视一个事实:经济增长既是财富积累的原因,同时又是财富积累的结果。想一个简单的道理:为何现代意义的增长发生在近代,而人类经济几千年来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增长呢?当然可以找出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理由。但是这样来看问题大约也不会错:现代生产是借助机器设备等资本品开展的迂回生产。没有财富积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是不可能有的资本积累和迂回生产发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增长也是财富

积累的结果。

战争与自然灾害由于消灭了财富,也就消灭了用来进行资本积累和迂回生产资源投入。从根本上讲,这是破坏了增长的基础,而不是如他们所说的会带来增长和经济繁荣。

上述分析是从供给层面来讲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对于经济增长的伤害。实际上,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消灭了财富,其还从需求层面伤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并非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说的,收入高边际消费倾向就低,这并不利于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是典型的静态的局部均衡分析,暗含了人的需求结构固定不变的假设。但实际上,随着收入增加财富积累,人们的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收入增加,我吃的馒头数量虽然不会同比例增加,但

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消费就不会同比例的增加了,因为现在我要买iPhone了,要带女朋友去海边度假了。收入进一步增长,或许我还要太空旅游,这些都是消费的增长。

我们观察到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丰富和复杂化。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前与经济停滞不前相伴的是经济结构的单一和没有变化。而工业革命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恰恰是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丰富和复杂化相联系的。只是我们可能忽略了,这种结构的不断丰富和复杂化,是收入增加财富积累的结果。战争和自然灾害由于消灭了财富,阻碍了这种结构的丰富和复杂化,而在客观上是损害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基础的。

事实胜于雄辩,还是回来讲个事实吧。很多人讲二战带来世界经济的复苏

与繁荣。对不对?也对,也不对。对的是二战的确实带来了重建期的经济繁荣。不对的是,二战同时带来了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滞胀。你是要看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短期功效呢还是长期功效?

问:战争和自然灾害拉动GDP增长了吗?答:拉动了重建期的GDP增长,但是降低了未来的经济增长。今年中国大面积发生自然灾害,这可能拉高今明两年的GDP增长,但是会降低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张五常教授讲得好:如果战争和自然灾害真的能够拉动经济增长,那么不妨把人类分成两部分,让这部分把那部分打个半死,再让那部分把这部分打个半死,一直打下去,岂不是就好了。但是这样人类就都死了,不是打死的,而是饿死的。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教授)



【三思而论】

纽约人和上海人一样善于精打细算,他们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

纽约的珍珠奶茶

陈思进

我感觉,纽约人的某些特征很像从前的上海人,喜欢吹嘘自己。

特别在曼哈顿的“纽约客”,他们蜗居在那片小小狭长的半岛上自得其乐,与陌生人交往的时候很冷淡,通常保持着“十八英寸”的距离,似乎时刻保持高度的戒备之心。

即使来自纽约以外的美国人也不例外产生疑惑,心想纽约人怎么能在如此拥挤、忙碌和狭窄的地方生活。而纽约人去美国其他的地方,只要一开口说话(不爱带“请”字),在公共场所往往理不饶人,经常被当地人质疑

“You must be from New York(你一定从纽约来的)”,因此对纽约人敬而远之。这时纽约客就会自嘲并宽慰自己:“如果你能在纽约生存,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

不过,也正因为纽约拥有国际大都市的地位,长期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运动员、传道士、学者、商人、金融家……也带来了不同国家的饮食文化。在华人聚集的唐人街,销售珍珠奶茶(Bubble Tea)的糕饼店至少有十几家。

珍珠奶茶是台湾人发明的饮料,在茶里加奶、加糖及“珍珠”(木薯粉),如此一来人们不再是“饮茶”或“喝

茶”,而是喝的同时在吃珍珠粉圆,使上海人的“吃茶”变得货真价实(上海话,喝茶叫吃茶)。

有一天下班,我和英国同事伊凡来到唐人街,见许多糕饼店推出“买一送一”珍珠奶茶——即,买小杯送一杯,买大杯送大杯。于是,我请伊凡喝一杯。我俩“连喝带吃”一杯下肚,伊凡还想吃个中杯,但是我饱了,便对柜台上的女孩说,不要两大杯,能否把两小杯换成一个中杯。她说不行。

伊凡站在旁边推了我我说:“老板拒绝小杯换大杯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只付了小杯的钱,他们等于降价销售,中杯的价钱就变成了小杯的。降价的

结果只服务了一个顾客,也降低了收入。坚持买一送一没有降价求售,不会有损产品形象,在赢得优惠顾客美誉的同时,又服务了两个顾客,会增加产品的覆盖率和用户群。比如我,今后只要来唐人街,就会来吃这家的珍珠奶茶。”

伊凡不愧是金融分析师,一眼便看穿了店家的销售策略:尽管两小杯奶茶的体积超过一个中杯,而塑料杯的成本每个也要八分,店家却宁愿多给客人饮料,多用一个杯子。但同样是销售珍珠奶茶,我从来没有在多伦多享受过“买一送一”的待遇。

我不禁想到,纽约人和上海人一样善于精打细算,他们勤快、守信守

时、讲效率,具有优于其他地方的实践能力,极富创意思维和行动快捷的管理能力。一如纽约聚集了全世界的精英人士,形成了纽约“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口永远维持在800万。而上海则吸引了全中国的精英,才有了今天的新上海人。

正如一位美国人这样评判上海人:“纽约人把纽约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上海人也有这种感觉。他们对城市有烦恼有抱怨,尽管如此,他们仍热爱自己的城市,对城市有一种依附着”。从这一点来看,纽约和上海又是开放的,是真正具有文化多样化和海纳百川的城市。

(作者系加拿大皇家银行投资顾问)